

革命先驱李天钊

杨树升 编著

肩擔道義
手著文章



北京大学出版社

革命先驱李大钊

杨树升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革命先驱李大钊

杨树升 编著

责任编辑 任俐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375印张 46千字

1989年9月第一版 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62,000册

ISBN 7-301-01040-0/K·075

定价：0.90元

“索我理想之中华”

——《革命先驱李大钊》前言

王 立 行

1989年10月29日，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大学出版了向广大读者介绍他的生平事迹的《革命先驱李大钊》，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李大钊是最早在中国热情而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组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国共合作、新文化运动等方面，都发挥了极其卓越的作用。他那种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对青年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提携，深厚的学识和道德修养，在敌人法庭和刑场上英勇无畏的气概，在当时就为广大青年和人民所敬仰。而贯穿这一切的，是他对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不畏艰险牺牲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执着精神。这正是我们今天纪念李大钊时所要学习和继承的主要之点。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生气勃勃地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国家要强盛，要有理想。一个人要生活得有意义，也要有理想。没有理想，就没有灵魂，没有动力，没有凝聚力，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在现阶段，我们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是把中国建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和先进分子的理想，是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在“文革”以前，对人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但在“文革”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伤之后，在一些人心中，却产生了一些迷惑和疑问：社会主义制度既然优越，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搞了几十年，经济和物质生活水平还这么低？出现这些问题是难免的。在革命运动遭到重大挫折的时候，人们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来总结经验教训。有些人死抱住导致挫折的错误不放，因而既不能对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也不能改变局面。还有些人不能全面看问题，从而对运动的宗旨产生怀疑和动摇，以至悲观失望，这也是于事无补的。正确的态度是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和错误的经验，找出发生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踏上新的征途，这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走过的道路。

如果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观察，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建设是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以中国来说：

社会主义使中国从一个被人歧视欺侮，受人宰割摆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变成为独立自主决定政策，在世界上受到广泛尊重的重要国家。

社会主义使几亿劳动人民的政治、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摆脱了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境遇。

社会主义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了一个较高速度的发展。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若干重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居于世界前列。人造卫星、火箭、核能等高科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有很大增强。

社会主义使几亿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有明

显改善，绝大部分地区实现了温饱，部分地区开始向小康生活前进，贫困地区减少。

社会主义使旧社会广泛存在的若干腐败现象如娼妓、吸毒、土匪、黑社会等基本得到消除。

应当承认，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过严重的错误和挫折，比如：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然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动荡和广泛伤害；一些具体制度和体制僵化，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多年来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未能较好地利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市场来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忽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不能防止重大错误的发生；长期忽视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过多，等等。十年改革使社会主义在中国重新获得生机，再次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和巨大的变化，当然，不容讳言，在取得很大成就同时，也存在着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分配不公、腐败现象等亟须下大力量解决的问题。

如果我们全面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就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具有优越性和生命力的。就在这个制度下，凡是我们的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基本正确的时期，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2~1957年），困难时期后的恢复期间（1963~1965年），改革时期（1978~1988年），都是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秩序安定，各方欣欣向荣，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高于一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出现挫折、停滞、调整的时期，如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文革”时期（1966~1976年），问题并不是出在根本制度上，而是我们的方针、政策在一些方面背离了社会主义特别是初级阶段的客观规律和某些具体

体制的僵化上。我们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社会主义制度有优越性、有生命力、有前途。第二，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初步成功之后，要防止僵化，继续进行探索 and 改革，努力建立一套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机勃勃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才能避免大的错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要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还必须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规律进行过精深的研究，作出了精辟的论述，创立和发展了共产主义学说。他们的基本理论是正确的，经得住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能够精确地预测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切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有许多新的发展，例如，新技术带来生产力的新发展，资本和生产的进一步国际化，金融资本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干预经济的多种形式，一定程度上缓解和推迟危机的种种措施，维护政治统治的若干新手法，以及国际关系的新变化，等等。对于这些，我们需要进行系统的科学的精深研究，以发展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世界。但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再认识的时候，绝不可忽略另外一面，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几十年来，就总体来说，处于一种发展缓慢的时期，以生产停滞为特点的周期性危机不断出现，能源危机、股票危机带来巨大震撼，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及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继续存在，一些有识之士对美国巨大债务蕴藏的危险忧心忡忡，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顽症，如贫富悬殊，社会腐败、吸毒泛滥、性病流行、犯罪猛升、人们对未来丧失信心等，不但没有解决，还在继续发展。当然，不能说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到了灭亡前夕，但把资本主义

社会看成一片光明，认为会永远存在下去的看法同样是盲目的。

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不是来源于善良愿望或道德原则，更不是一种迷信，而只能植根于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科学分析。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科学的全面的再认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发展和暴露，特别是随着改革为社会主义带来新的生机，给人民以实惠，并不断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人们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会越来越坚定，相信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早在少年时代，李大钊就心怀救国救民之志，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进行了艰苦曲折的探索，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坚定的信念，发出了满怀信心的壮语：“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几十年来，李大钊烈士等成千上万的革命者，为了在中国传播和实践共产主义理想，前赴后继，献出了毕生精力以至于生命，为中国的解放和复兴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现在，接力棒已经传到今天的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手上。我们的历史使命，是继承李大钊烈士等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和献身精神，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投身于改革大业中，不怕挫折，不畏困难，严格要求自己，以自己的坚定信念和模范行为，和广大群众一起，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奋斗，为建立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体制而奋斗，这就是对李大钊和成千上万的革命先辈最好的纪念。

1989年3月

目 录

“索我理想之中华”

——《革命先驱李大钊》前言·····王立行	(1)
冀东热血少年·····	(2)
忧国志士的寻求·····	(5)
含愤东渡·····	(8)
《晨钟》与《青春》·····	(12)
红楼的灯光·····	(15)
怒吼的北京·····	(21)
青年的良师益友·····	(23)
中日友好传佳篇·····	(28)
“亢慕义斋”的岁月·····	(31)
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35)
党的主要创始人·····	(39)
国共合作作贡献·····	(42)
长城渤海起风暴·····	(47)
松柏傲风雪·····	(52)
生命的音响 生命的光华·····	(56)
人民的忠仆·····	(59)
宝贵的精神遗产·····	(62)

革命先驱李大钊

李大钊同志是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一百年前（1889年）的10月29日，大钊同志诞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这里地处冀东平原的东端，南临波涛起伏的渤海，北望挺拔雄峻的碣石山。一千八百多年前三国时代的政治家曹操，曾“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三十五年前，就在距此不远风景如画的北戴河，毛泽东面临一望无际的大海，高吟“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这是一片美好的土地！在这片美好的土地上，生长着千千万万勤劳勇敢、慷慨豪放的人民。他们热爱自己的家园，热爱连着自己家园的一片又一片广袤的中华大地。一百多年来，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为着祖国的繁荣昌盛，他们奋斗着，奉献着，大钊同志就是从这块土地上诞生的。

大钊同志曾经说过：“历史的事件与人物，是只过一趟的，是只演一回的”。“我们只有随着这有进无退的时的流转，郑重的过这一趟，演这一回。”^①是的，大钊同志实践了自己所言，以自己的一生，“郑重”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演出了极其壮丽的一幕。

让我们溯着历史的长河，去追寻先驱者的战斗足迹……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669页。

冀东热血少年

在冀东家乡，大钊同志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①

大钊同志的童年是不幸的。他的父亲李任荣，是个读书人，早年得了肺病，在1888年6月乐亭大地震后病情加剧，于1889年4月病故，终年22岁。他的母亲周氏因哀伤过度，生下他一年多以后也去世了。大钊同志幼年就丧失父母，孤苦伶仃，靠祖父李如珍抚养。

祖父李如珍也是一个读书人，因自己没有儿子，就把侄子李任荣，即大钊同志的父亲过继为子。李如珍青年时闯过关东，有见识。他具有爱国心，不满清朝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深受乡民尊敬。这一点，对幼年的大钊同志颇有影响。大钊同志出生时，李如珍已经六十多岁了，从此祖孙二人相依为命。

祖父李如珍对大钊十分喜爱，但管教也非常严格。从三岁起，大钊同志就随祖父识字读书，白天教，晚上问，直到学会了才睡觉。有时祖父带他到亲朋家，他就把人家的门心、对联背下来。在村子里玩，就认村里的一些碑文告示。由于他专心学习，到五、六岁就有一定识字能力了。

大钊同志七岁的时候，祖父李如珍送他到本村西头谷宗海家私塾读书，老师是单子鳌先生。大钊同志学习异常勤奋、刻苦，对老师尊重，对同学友爱。虽在同学中年岁最小，他却是学得最好的一个。放学了，同学都回家了，剩他一人还坐在位子上背书。单老师往往要好几次催他：“耆年

^① 关于李大钊童年、少年时代，参见《李大钊年谱》（甘肃人民出版社）。

（大钊同志的学名），回家吃饭去吧。”可他总是要把当天的书背会了才肯回家。大钊同志小时勤奋学习的事迹很多，至今在他家乡还传诵着这样一个故事：他在屋里学习，窗外有两只麻雀打架，“叽叽喳喳”地越打越激烈，一会儿滚到他面前的窗台上，可他象没看见似的，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大钊同志学习进步很快，三年以后，单老师就对他祖父说：“耆年学业良好，我已经教不了他啦，还是另请高明吧。”1899年，十岁的大钊同志便转到本村张家书馆，跟秀才赵辉斗先生念书。念了两年，又转到乐亭城北井家坨宋举人家去读书，老师是黄玉堂先生。在井家坨读书时，大钊同志更加刻苦了，晚上同学们都睡了，唯有他还在油灯下攻读，直至深夜。黄老师也很喜欢他，回到家里还念叨：“有个学生叫李耆年，念书念得特别好”！

大钊同志少年读书之时，也正是中华民族危机日甚一日之时。他五岁上，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十一岁时，又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不久，义和团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到大钊同志家乡一带。由于乐亭县外出经商的人较多，消息较为灵通：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清朝政府的腐败，人民生活的痛苦，这一桩桩，一件件，在大钊同志脑海里留下一连串问号。他常问老师：“为什么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为什么穷人没饭吃，没衣穿？”……

大钊同志十四岁那年年底，有一天，黄老师给大家讲起了太平天国的故事。他讲了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善于思考的大钊同志，立即向黄老师问道：“洪秀全的很多主张不都很好吗？为啥还说他是造反呢？”

黄老师停了停，摇了摇头说：“这个么……你可把我考住了。”停了一会儿，又说：“以我之见，好行新法者，违俗而招祸呀！”听到这些，大钊同志却激动地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推翻清朝皇帝！”黄老师赶忙劝阻他：“你说话可要谨慎呀，别招来祸害！”但是，这时的大钊同志虽然年少，却根本不怕祸害不祸害，因为在他心中已埋下了憎恨帝国主义侵略和昏庸腐朽的清王朝的火种。

1905年，大钊同志到离乐亭县约一百里的卢龙县永平府考秀才，正赶上清政府废科举而考入永平府中学。大钊同志在永平府中学两年，学习启蒙科学和英语，初步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又了解了戊戌变法的情况，思想面貌发生变化。他常和要好的同学议论时政，对祖国的命运更加关切。他入学之初，又有日本和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着争夺权益，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战争。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居然宣布中立，任凭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屠杀中国人民。眼见民族的灾难更加深重，大钊同志心中的火种在熊熊燃烧，满腔的热血在沸腾！就在这时，十六、七岁的大钊同志，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奋斗。也就在这时，他毅然把自己“李耆年、字寿昌”的名字改为“李大钊、字守常”，这表明他要时时勉励自己，为实现这个远大的理想，矢志不渝，壮志不改，奋斗终生。这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①这气壮山河的铿锵语言，至今读起来仍感人肺腑，震撼人心！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893页。

忧国志士的寻求

决心要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大钊同志在思考：究竟应选择怎样一条奋斗的道路呢？当时，他深感“国势之陵夷”，“国势之危迫”，便“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就是说，大钊同志为了祖国和人民，要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样，他便不满足在家乡的学习，他要深造，他要飞向更广阔的天地中去。但是，不幸的是，他八十多岁的祖父这时去世了，家里的一点财产被一些亲戚挥霍殆尽。井家坨的宋举人表示愿意资助他，但他认为宋家为官钱来得不正，拒绝接受。正当大钊同志为难之际，他的妻子赵纫兰——一个勤劳、朴实的农家姑娘，理解他，鼓励他，表示愿意靠省吃俭用，典当挪借供给他一切费用。妻子的支持使他下定了决心。1907年夏，“急思深研政理”的大钊同志，等不及中学毕业，就与同学一起到了天津。

当时，天津有三个学校正在招考：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立志要研究政治的大钊同志，认为医学和银行业都不符合他的志愿，决定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以优异成绩被学校录取。

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里，大钊同志学习了政治、法律、经济诸学以及英、日语。他学习刻苦努力，能诗善文，是学习成绩最突出的一个，被誉为“北洋二杰”之一。

大钊同志以兴奋的心情，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当时称为“新学”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书籍，如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著作，以及十九世纪欧洲宪政与民主的理论。他

深受这种反对封建主义、要求民主自由思潮的影响，从而开始树立民主主义的观点。正如他自己所说：“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

在校期间，大钊同志开始参加政治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的成功，使大钊同志极为振奋。他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也曾打算投笔从戎。

在辛亥革命前，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就已有革命党人进行活动。与大钊同志有深厚师生情谊的史地教员白亚雨先生，就是一个著名的革命党人，早年上海参加同盟会，为开展北方革命工作，来到天津在北洋法政学校任教，是同盟会京、津、保支部的重要成员。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了大钊同志。为了加速清王朝的垮台，白亚雨等革命党人决定在京津一带清王朝统治的心脏地区策动起义，几个受白亚雨影响的学生成为他的助手。大钊同志曾奔走于天津、滦州以至于家乡乐亭一带，从事联络等活动。1912年1月2日，冀东滦州起义爆发，新军二十镇三个营的义军，高举大旗向北京进攻，风声所及，使清朝统治者心惊胆裂。但是，由于寡不敌众，起义失败了。白亚雨先生是起义军参谋长，起义失败被捕后英勇不屈。在就义时，挺身不跪，昂首宣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白亚雨先生为革命断头流血的壮烈事迹，使大钊同志多年悼念不已，也更加激越了他献身于革命的大无畏精神。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2月12日，清宣统皇帝溥仪退位。次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辞职。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通电致袁，称赞他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在当时，大钊同志

与其他先进的中国人一样，还不可能认识到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在袁世凯窃国大盗的真面目未暴露之前，也还没有一下看清他的本质。因而大钊同志为新生成的共和国而兴奋，而欢呼，他挥笔作诗：

“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何当驱漠北，遍树汉家旗”。这时，他希望加强以北京政府为中心的全国的统一，群策群力，“一力进于建设”，^①希望尽快把中国建设成如同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时期，他利用在学校学习的法政知识，写下了《一院制与二院制》、《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欧洲各国选举制考》等一系列文章，以期中华民国走上轨道。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眼前一幕又一幕的严酷事实，使大钊同志起初的欢快心情荡然无存。对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他又忧心如焚了。面对新建的共和国，他先是写下了《隐忧篇》，继而又写下了《大哀篇》。他在文中痛心疾首地写道：中国人民依然“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斃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②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民国建立了，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呢？没有，一点没有，“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民国刚刚建立不久，“环顾神州”，却是“危机万状”，大钊同志困惑了。他思索着，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1912年冬，他曾到北京，与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交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1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6页。

往，并加入了社会党，以后又任天津社会党支部干事。他探索着，想探出个究竟。但“是非之不明于天下久矣”，^①眼前纷纷乱乱的现状使他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他陷入一种深深的苦闷之中，甚至一度产生出世思想。然而，可贵的是大钊同志心里一直是装着祖国和人民的。一天，他在天津的大街上走着。突然，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病倒在路旁，大钊同志赶忙跑过去照料，虽然自己学生生活很清苦，但他却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刚得来的一些稿费，分文不留地全部送给了这位穷苦老人。老人感动得再三再四地向大钊同志道谢，但老人的感谢却使他的心在颤抖。是啊，祖国有千千万万的同胞象眼前这位老人一样，在受苦受难……强烈的救国救民的责任感，驱使大钊同志从一时的困惑、苦闷中摆脱出来，他又振作起精神，勇往直前了。

1913年夏，大钊同志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不久，得到友人的资助，决定东渡日本留学，以期深造，开阔眼界，继续去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含 愤 东 渡

1914年1月，大钊同志怀着“去国徒深屈子恨”的心情，从天津乘船，东渡日本。船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大钊同志的心潮也象大海一样起伏难平……

就在他留学前夕回乡探亲之际，在碣石山旁的昌黎火车站碰上了日军无端惨杀五名中国路警的血腥事件：一天晚上，在站前的夜市上，一个日本兵从小贩的果筐里拿水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59页。